

李昌龄注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文本探析

李 冀

提 要：“蜀士李昌龄”注解的《太上感应篇》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《太上感应篇》注本，该书大体成于淳熙二年至嘉定十五年之间。李昌龄注本在得到郑清之作赞、宋理宗推崇后方大行于世，其注本主要通过“灵验记”“引经”“征事”三个方面注解《太上感应篇》，这一注解形式为此后的众多《太上感应篇》注本继承和发扬。李昌龄身为儒士，却以三教经典与故事注解《太上感应篇》，这种以儒为主却兼融三教的思想不仅扩充了《太上感应篇》的内容，同时成为《太上感应篇》被社会各阶层接受的重要基础，是《太上感应篇》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李冀，哲学博士，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。

关键词：李昌龄 太上感应篇 宋代

学界不乏关于《太上感应篇》（简称《感应篇》）的论著，酒井忠夫、李刚、朱越利、陈霞、游子安等人皆有相关阐发^①，但是《感应篇》为何能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？有没有一些关键的节点被大家所忽视呢？一般学界将《感应篇》的流行与其特殊的文本形式结合起来进行探讨，但是《感应篇》的流行得益于宋理宗的推崇，而宋理宗推崇的是李昌龄注本，赐禁钱百万刊印的也是李昌龄注本，直至清顺治帝所阅的《感应篇》也为李注本^②，但是学界却少有对李注本关心，大家的目光基本集中于李昌龄是否《感应篇》的作者这一问题，本文则将焦点放在李注本的文本上，通过对李注本的文本情况的探析，试图寻找李注本与《感应篇》流行的内在逻辑。

一、李昌龄及其《太上感应篇》注本

探讨李昌龄及其注本之前需要厘清以下两个问题：其一是注解《感应篇》的是哪个李昌龄，其二是李昌龄注本的成书情况。

第一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，是因为宋代有多个李昌龄。宋儒真德秀说：“《感应篇》者，道家佐世书也。蜀士李昌龄注释，其义出入三教中，凡数万言。”^③宋代陈奂子说：“载读《感应灵篇》，与蜀士李昌龄之注……”^④真德秀和陈奂

子认为是“蜀士李昌龄”注解了《感应篇》。但是清代一些学者有不同看法，盛百二说：“《太上感应篇》……故宋时即有李中丞昌龄所注释，真西山亦屡为之序。”^⑤郝玉麟说：“宋初李天锡表出于《道藏》，为之作传，南宋郑德源作赞，理宗尝以禁钱百万刊布，先儒西山氏复序而行之。”^⑥盛百二等人说的是御史中丞李天锡注解了《感应篇》，那究竟应以何方为准呢？

关于李天锡，《宋史》有详细的记载：“李昌龄，字天锡，宋州楚丘人。曾祖确，胶水令。祖谭，邯鄲令。父运，太常卿。昌龄，太平兴国三年举进士，大理评事、通判合州。历将作监丞、右赞善大夫、通判银州。京城开金明池，昌龄献诗百韵，太宗嘉之，擢右拾遗、直史馆，赐绯。改右补阙，出知滁州。丁内艰，起为淮南转运使，转户部员外郎、知广州。”^⑦从以上史料可知，李昌龄，字天锡，家族世代为官，其本人颇有文采，官至监丞、右赞善大夫、通判银州。

因为史书对于李天锡记载较多，《感应篇》也被认为是李天锡所作，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：“李昌龄《感应篇》一卷。”^⑧直至今日，部分书籍仍将李昌龄看作《太上感应篇》的作者，如《简明中国古籍辞典》说：“《太上感应篇》，道教典籍。宋李昌龄（937—1008）撰。一卷。”^⑨国外最为重要的《道藏》研究成果——《道藏通考》，同

样认为李昌龄撰《太上感应篇》^⑩。由此可见，当今国内外部分学者依然接受与采纳了《宋史》的观点，认为李昌龄是《感应篇》的作者。不过这一看法已经被学界广泛论证并予以否认^⑪，况且李注本有“乾道八年”（1172）语，试问卒于1008年的御史中丞李昌龄如何能言百年之后的事？可见，此御史中丞李昌龄并非《感应篇》注者。

再看“蜀士李昌龄”，目前学界对四川的李昌龄有以下认识。王利器认为：“李昌龄字伯崇，眉山人，原籍陇西。”^⑫李剑国认为：“李昌龄，字伯崇。眉州眉山县人。淳熙间进士。”^⑬两人的依据是李昌龄所撰的《乐善录》，宋刻本《乐善录》的重现，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“蜀士李昌龄”的具体情况。《乐善录》载有何荣孙隆兴甲申（1164）七夕日序：“陇西李伯崇，迎曦先生之曾孙，天资乐善，得《南中劝戒录》，伏而读之，深有契于其心，遂博览载籍，旁搜异闻，凡有补于名教者，增而广之，分为十卷，名之曰《乐善录》，亟镂板印行，使家家藏此书，以广天下乐善之风，此伯崇胸怀本趣也。”^⑭何荣孙言李伯崇是陇西人，迎曦先生的曾孙，天生有乐善之心，在《南中劝戒录》的基础上完成《乐善录》一书。《乐善录》至迟刊印于隆兴二年（1164），李昌龄将《感应篇》也纳入其中，如此证明李昌龄与《感应篇》关系密切，况且宋人赵希弁在《郡斋读书附志》中也说：“《太上感应篇》八卷，右汉嘉夹江隐者李昌龄所编也，希弁生父师问尝为之序。”^⑮真德秀、陈奂子、赵希弁三位宋人皆认为“蜀士李昌龄”注解《太上感应篇》，此言应是不假。由此可知，《乐善录》编者与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注者应同为一人，皆是“蜀士李昌龄”。

那么李昌龄的《太上感应篇》注完成于何时呢？萧登福认为“李注约完成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（1164）”^⑯。李剑国根据李注本“自绍兴二十八年置，至乾道八年”^⑰语判断《太上感应篇》注成于乾道八年（1172）后^⑱。而笔者认为，李注的成书上限要更晚，至少在淳熙二年（1175）以后。李昌龄谈到同乡何熙志时，言其死后之事，而何熙志在淳熙二年（1175）还任潼川府路转运判官^⑲，其后则无记载。可见，李昌龄的撰写时间至少在淳熙二年以后。关于李注的成书下限可参看郑清之在《太上感应篇至言详解》中的序文，郑清之于嘉定十五年（1222）至嘉定十七

年（1224）任国子学录时曾向宋理宗提到了李注本。由此可见，李注本的成书至少在淳熙二年至嘉定十五年之间^⑳。

李注本的名称并不固定，宋刊本称为《太上感应篇至言详解》，国图藏元刊本、明《正统道藏》本和日本藏明刊本的封面皆为“太上感应篇”。另李注本又有8卷本和30卷本之分。明《道藏》李注本共30卷，不过胡莹微和赵希弁都说李注本是八卷本，胡莹微说：“臣谨以所刊御题《太上感应篇》一部八卷，随表上进以闻。”赵希弁在《郡斋读书附志》^㉑中说：“《太上感应篇》八卷……”^㉒直至清代沈叔埏《太上感应篇印章序》也称李注为8卷，“时汉嘉夹江隐者李昌龄编为8卷”^㉓。另据国图所藏元代刊本以及日本明刊本，两个版本皆为八卷本，三者相互比照可知，《道藏》30卷本为8卷本析卷所致。由此可见，李注最早为8卷本，至明代，8卷本与30卷本两个版本通行于世。

二、李昌龄注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文本结构与特点

《太上感应篇》在李昌龄注解之前，并无太大影响力，如胡莹微所言“宝藏之诸经中，有瑶编之大训”^㉔，很多人并不知晓它的存在。李昌龄的注解改变了《感应篇》的命运，此后郑清之向宋理宗推介此书并作赞，宋理宗赐禁钱百万刊印是书，在此影响下，才有《感应篇》风行于世的后话。

从郑清之的话语中可以知晓他向宋理宗推介李昌龄注本的原因，他说：“一日，语及善恶之报，因谓李昌龄所注《感应篇》该贯殚洽，信而有证，亦可助教化者。”^㉕郑清之教授理宗时，一日论及善恶之报，提到了李昌龄所注的《太上感应篇》，郑清之认为李注博通详尽，言之可信，信而有证，有助于王道教化。郑清之所言的“该贯殚洽，信而有证，亦可助教化者”皆可在李注的文本中找到答案。

若以文本结构而言，李注本主要由“灵验记”和注解构成，其注解又可分为引经、征事、评议三个部分。

所谓的“灵验记”并非李注本的固定用语，在不同的李注版本中，其名称并不一致，国图藏元代李注本题为《感应篇灵验记》，日本藏明代李注本题为《奉行此篇灵验记》，明《道藏》本题为《记述灵验》。总之，“灵验记”是由多个故

事组成，这些故事是人们通过阅读和奉行《太上感应篇》后产生并被记录下来的。而这类灵验故事并非宋人独创，唐代杜光庭就曾专门搜集整理出各类善恶报应的故事，编为《道教灵验记》一书，书中大部分故事的主角由普通民众担当，体现了道教通俗化的特征。李注本的“灵验记”也并非李昌龄独创，但是在李昌龄注本中得以固定且愈加丰富。

国图元刊本和日本藏明刊本的“灵验记”有两则故事，主角分别为王湘与周箴，这两则故事同样载于《乐善录》中，文后标记为“《感应篇跋》”。这两个故事发生在蜀地，也就是说《太上感应篇》在宋淳熙年间已有一定的民间影响力，且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蜀地。蜀人将涉及《太上感应篇》的灵验故事记录在《感应篇跋》中。通过对比李注的不同版本可知，虽然两则故事相同，但文内个别语句却有差异。此外，国图藏元刊本和日本藏明刊本的“灵验记”仅有王湘与周箴两则故事，明《道藏》本的《记述灵验》却多出台州仙居县城西王竺、新都杨道机、简州进士王巽、黄严县郭进士杨琛、进士沈球、真大圭等多个灵验故事，这些灵验故事同样收录于明胡文焕《格致丛书》中。《记述灵验》后加的故事基本发生于南宋末，不见于李昌龄《乐善录》与元明的《太上感应篇》版本中，应是《道藏》的编纂者将后续的故事一起收入了《记述灵验》。

虽然李昌龄并非第一位为《太上感应篇》添加灵验故事的人，但是将原本附于《感应篇》后的故事置于文首，并以“灵验”为题，确以李注本为始。李昌龄以“灵验”一词保留下这些故事，让《太上感应篇》的内容变得更加丰满，使得读者在开篇之际，就知晓了阅读和奉行《感应篇》的益处。

李注本最大的功绩在于引经与征事的结合运用。关于引经的注解方法在道书中很常见，但是将引经和征事结合的注解方法，在道书中并不常见，李注本在这方面可谓独树一帜。今以李昌龄注解“人皆恶之”句略作分析：

按《七星移度经》，阴匿闇昧，伏奸藏欺，不义不仁，无恩无德，北斗定为大恶人。阴匿暗昧，伏奸藏欺，不义不仁，固大恶；无恩无德，亦大恶欤。大抵无德无恩，则功不及人；阴匿闇昧，伏奸藏欺，不义不仁，则害必及物。其为不善，实皆一也。今

为人而至使人皆恶者，必自取也。

昔丁晋公与寇莱公，同在政府。天下之人，识与不识，闻莱公之名，则必许为忠；盖闻晋公之名，则必目为奸谏。闻一善，必以归莱公，未必皆莱公所为也；闻一不善，必以归晋公，未必皆晋公所为也。物论如此，而鲸波之设竟如此，岂非功不及人，而害多及物乎？经云：喜集则福生，怨积则祸至，信不诬矣。昔杜祈公知干州，岁未满，改知凤州。二州之民，争于界上，一曰：我公也，汝夺之。一曰：今我公也，汝何有焉。张忠定再镇蜀，蜀中之民，无不鼓舞，相庆如赤子之久失父母，知公之来必能复鞠我也，至今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。然则二邦之民，所以喜二公者，为何如？

呜呼，与其怨积，孰若喜集，戒哉。^⑧

针对“人皆恶之”四字，李昌龄以《七星移度经》为引，探讨恶人令人生厌的地方，并通过丁晋公、寇莱公、杜祈公三人事迹解释此句，最后以“呜呼”结尾，李注文内常以“呜呼”作为其最后自我阐发的起始词。分而析之，则可将这种三段结构总结为引经、征事与评议三个部分。李注本的评议通常是对引经和征事的概括性的简炼语句，或位于文中或位于文末，位置并不固定，今主要探讨李注本的引经与征事部分。

关于引经，李昌龄并非只引道经，而是引三教经典。首先这得益于其时蜀地三教典籍的丰盛，嘉佑初年，在道士姚若谷、朱知善、仇宗正、邓自和的努力下，成都天庆观、郫县崇道观、青城丈人观、梓州飞鸟县之洞灵观、绵州洪德观皆备《道藏》，供学者览阅，加之“释氏书遍满州县”^⑨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李昌龄有机会览阅《道藏》与佛典，这为其注释《太上感应篇》提供了文献上的支撑。其次，李昌龄虽然引用了大量的三教经典，但是从他的注解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三教的态度。总体而言，他抱有以儒为主却兼融三教的思想，他说：“贤圣有三，在佛家言之，三乘中人是也；在道家言之，五种仙是也；在吾儒言之，孔孟诸君是也。立教虽各不同，心地法门则皆一也。”^⑩三教名称虽然不同，但是其心地法门却一致，不过这句话中，他言及儒家时在儒前面加个“吾”字，这也是他对自身身份的一个认定。他在注解时常言“吾儒”二字，例如“又如草木一类，在吾儒言之，固若有生而无知，

验以佛书则亦不可一概谓为无知”^②。又如“径者，不正之路也。即吾儒所谓澹台灭明，行不由径之径也”^③。这种身份认定反映在注解方面，则表现得更加明显，例如他常为儒家辩护，“稊食饕人，吾儒亦自言之。《曲礼》曰：毋反鱼肉是也，谓己历口也。若以因果言之，不惟捐福，定当掇祸。不闻拭眼禅师、瞿永寿之事乎”^④？意思是“稊食饕人”并非只有道家说，儒家同样重视。又如：“是故元始上帝称北极为中极，宝上真人称北斗七星为中天七星，而吾儒亦云：斗为帝车，运于中央，临制四方，分阴阳，建四时，均五行，移节度，定诸纪，孰谓为不然乎？”^⑤也就是说，北斗也并非只有道教提及，儒家同样有论述。这些语句中可见李昌龄的立场和态度，他虽然为道经《太上感应篇》注释，却在融合三教的基础上，字里行间常带有身为儒士的自豪感，而正是这种维护儒家的态度，成为《感应篇》被更多的儒生接受与推广的原因之一。

关于征事的部分，总体而言，李注本所述故事有数量众多、历史跨度广、地域跨度广、所述人物丰富这几个特点。说其种类繁多，是因为李昌龄引用了多达数百个历史事迹与传奇故事，皆蕴含善恶相应与因果报应的思想。说其历史跨度广，因为李注本所涉及的故事时间段从先秦至宋的各朝各代。说其地域跨度广，因为李注本所述故事涉及当时大部分的地区，例如青州、郓州、密州、兖州、巢州、亳州、常州、徐州、邠州、延州、庆州、福州、郑州、湖州、冀州、定州、赵州、潭州、吉州、潞州、广州、巴州、益州等等。说其所述人物极为丰富，因为各个阶层皆在其注本中展现，帝王如宋景公、唐高宗、宋太宗等；宰相如司马光、王安石、吕蒙正、王旦等；名臣如赵抃、王古、寇莱公、柳开、李昉等；另有知州、知县各类官职人士不可胜数；其他社会阶层，如孝子阴子方、医工聂从志、吴家媳妇朱十二、巨富范伟、贼首黄三狗、妓女杨素真等等皆有提及；道教人士如许真君、陶弘景、孙思邈、陆修静、钟离权、吕洞宾、女仙杨正见、好道傅先生等等；佛教人士如僧契虚、西域僧觉称、大慈寺僧修准、僧惠觉等等。

李注本征事的丰富性成就了其“十万言”之巨，而李昌龄对于劝善故事的重视得益于两个方面，首先与宋代小说发展背景不无关联，鲁迅曾说“宋好劝惩”^⑥，宋代有大量的劝善惩戒故

事问世，宋人也乐于收集此类故事，李剑国说：“宋人这类作品很多，多由当事人现身说法，以惩戒世俗。”^⑦李昌龄的注释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。此外，李昌龄在注解《太上感应篇》之前，已经完成了《乐善录》一书，《乐善录》引用《劝戒录》《回应录》《因果录》《湘山野录》《夷坚志》《高僧传》《高道传》《集仙传》等书中的劝善故事，这成为李昌龄注解《太上感应篇》时的重要文献材料，丁岚认为：“由两百余条劝善故事组成的《乐善录》中，竟有多达五十余条劝善故事与《太上感应篇注》存在重合的关系。”^⑧由此可见，正是李昌龄“博览载籍，旁搜异闻”，才造就了李注本故事的丰富性。

三、李昌龄注《太上感应篇》的影响

以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，李昌龄是第一个为《太上感应篇》作注的人，他也成为影响《感应篇》流传的关键性人物，如钱大昕所言：“此书（《感应篇》）之传盖自李始矣。”^⑨李注的影响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首先，李注的影响超过《感应篇》的其他注本。李注本产生于宋代，但是它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南宋时期，是书在元、明、清三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且通过日本明刊本可以看出这种影响还扩展至海外。早在南宋时期，刘燠曾捐资辅助李注本之流布，真德秀为其作序与跋，真德秀说：“李氏首章注义最为近理，予故表而出之。”^⑩南宋陈天昌说：“若夫李君集注，世网犹如，惩妄破谰，迎刃解散，所以去人心之危疑，直跻霄汉之风云也。”^⑪清代汤来贺说：“言此道者，莫如《太上感应篇》李公昌龄之注，郑公德源之赞。智愚皆可以共喻。”^⑫包括清顺治帝御注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他所阅《太上感应篇》注本也是李注本，他说：“世有《太上感应篇》者，其来甚久，相传乃葛玄所受，宋李昌龄、郑清之分为注赞。”^⑬由于顺治帝对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推崇，促使《太上感应篇》诸多注本随之问世，大儒惠栋、俞樾等为《感应篇》作注，李注的影响才逐渐减弱。

其次，李注本使得《感应篇》流行起来。在李昌龄注解《感应篇》之前，《感应篇》已经在蜀地流传，这在李昌龄《乐善录》的《感应篇跋》中已经有所体现。但《感应篇跋》所述的几个灵验故事都发生在蜀地，反映出该篇的影响还

没有扩展至其他地区，而李昌龄的注释才让《感应篇》流通更广。清代沈叔埏说：“（《感应篇》）唐以前未有闻者，宋高宗御书后，理宗赐禁钱刊行，大儒真西山辈为之传赞记序，时汉嘉夹江隐者李昌龄编为八卷，赵师何为之序，四明史弥志跋其后，而后大显于世。”^⑧余集也认为李昌龄是《太上感应篇》流传至今的首要功臣，不过他错将李天锡看作《太上感应篇》注者，他说：“《感应篇》，向列《道藏》，宋理宗发禁钱命工刊布，真西山为之序，李天锡为之传，其流传之首基也。”^⑨从中可见李注本对《感应篇》广泛流传的重要影响。

再次，李注的注解形式直接影响了此后诸多《感应篇》注本。李昌龄以“灵验记”“引经”“征事”的篇章结构，为后世的《感应篇》注本提供了参考。

清代诸多《感应篇》注本皆有“灵验记”，且灵验记的内容愈加丰富，众多故事还被分类别，不同类型故事被冠以不同的标题，如“川西夫子”刘沅的《太上感应篇注释》载有《感应篇奇验》，将灵验故事分为“福亲”“诞子”“贵显”“富贵”“延寿”“愈病”“免危”“遇仙”“悟道”“新验”。其中的“贵显”条目中例举了西蜀李昌龄和郑清之因传赞《太上感应篇》而显贵。不过该书未加考证，认为李昌龄因为注解了《感应篇》而官至御史中丞，文曰：“西蜀李昌龄为光州守，平反冤狱甚著声绩，祥注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助宣教化。此书大旨遂得昭明于世，所获福祉甚多，历官御史中丞终秘书监，后集注多集李注语。”^⑩可见，这些灵验记真真假假，并未完全可信。

关于“引经”方面，惠栋的《太上感应篇笺注》和俞樾的《太上感应篇缙义》将此点发挥到极致，惠栋本又称《太上感应篇引经笺注》，从中可见其“引经”之特色；而俞樾基本用儒家经典解释《感应篇》，在儒家典籍无法圆说的时候，则说某某“不见经传”，而后才引述道经，如“又有三尸神”句，俞樾注：“三尸之说，不见经传。然葛洪《神仙传三·刘根传》载神人韩众谓根曰……”^⑪这反映出儒士对于《感应篇》展现出的复杂心理，即一方面存有身为儒士却注解《感应篇》这本道书的内在矛盾，另一方面又看到《感应篇》对社会教化的益处而不得不注解推广的纠结。

李昌龄注本的征事部分占据大量篇幅，此后的注本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，《太上感应篇汇编》《太上感应篇经史集证》则是征事方面的典范，里面引述大量民间传说与历史史料，例如《太上感应篇经史集证》在解释“太上曰：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；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”句时，共引证 35 个人物故事，依次为：汉邓禹、卫仲达、蜀郡王氏、袁了凡、清镇江布商李某、清吴公颐、豫章双生之人、曹彬、高邮张百户、正德沿海居民、监官县顾德谦、江夏令侯鉴、康熙永年县举人李司鉴、道光秀水人盛生、道光昆明寡妇杨媪、临川周士元、乾隆徽州男子、黟县姐妹、嘉庆平湖徐辛庵侍郎、宋吉州李明、嘉靖貌美的时一生、瞿嗣兴、道光河南房芝田、河南李见斋、宋方世隆、乾隆京师德胜门外老人、广西陈桂舫、万历淮西某秀才、江西廖仪卿、东海某家、余杭朱某、杭州邵某、常州胡某、无锡东门某姓、徽州程孝廉^⑫。在 35 个故事中，涵括多个朝代以及各式人物，时间尤以清代为主，可见劝善故事随时间的推移而越积越多，不同朝代有各自的价值取向，各个注本在故事的选取方面也有不同。

最后，李注以儒为主却兼融三教的思想促使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流传范围更广。《太上感应篇》虽然内含儒家天人感应、道教积善成仙和佛教因果思想，但原文只有一千余字，而且大部分内容是道戒，类似道书较多存于《道藏》之中，但为何只有《感应篇》脱颖而出呢？另外本将道家视为异端的儒生，竟然纷纷支持《感应篇》这本道书，从真德秀、惠栋、俞樾等人的态度中可见一斑，甚至有儒生担心《感应篇》是道书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为此篇作序作跋以推广；佛教徒也为《感应篇》进行注释和推广，如日南和尚注有《日南和尚增释感应篇》一书，清末民国时期的印光法师极力推崇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他自己不仅阅读了多种《太上感应篇》注本，而且亲自为《感应篇直讲》作序，推广其流行。

究其原因，《感应篇》能得到儒释道三教的共同重视正是得益于李昌龄的注释。从元、明两代李注本来看，《感应篇》常借李注本进行流传，人们所阅读的是李昌龄注解的《感应篇》，而李昌龄对《感应篇》的注解成为人们理解《感应篇》的重要依据之一。李昌龄虽然是名儒生，却喜好佛道二教，通读三教经典。李昌龄三教圆融

的思想在他的注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，他将一千余字的《感应篇》扩展至十万言的注释，使《太上感应篇》竟无所不包，这种包容思想使得《感应篇》为三教所接受，且直接影响了后期三教对于《感应篇》的看法，使得《感应篇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。

不过，尽管李注在历史上已经表现得尽善尽美，但在不同立场的人看来，李注仍然存在“幻怪”与“繁芜”的缺陷。真德秀说：“至其言有涉于幻怪者，要皆为警愚觉迷而设，予固未暇深论，览者察其用心而取其有补焉可也。”^⑥ 顺治帝言：“反覆原注，微觉繁芜，遂加删正，示以简要。”^⑦ 而这种情况其实又从侧面展示出李注的影响力。

(责任编辑：首之)

- ① 详见：[日] 酒井忠夫著，孙雪梅译：《中国善书研究》，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；卿希泰、李刚：《试论道教劝善书》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1985年第4期；朱越利：《〈太上感应篇〉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》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1983年第4期；陈霞著：《道教劝善书研究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99年；游子安著：《劝化金箴——清代善书研究》，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。
- ②④⑦ [清] 顺治帝撰：《御注太上感应篇》，《故宫珍本丛刊·子部道家类》，海口：海南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524册第334、334、335页。
- ③⑦④⑥ [宋] 真德秀撰：《西山文集》卷27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7年，第471、472、472页。
- ④ 《道藏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、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、上海：上海书店，1988年，第27册第2页。（以下所引《道藏》皆为此版本）
- ⑤ [清] 盛百二撰：《袖堂笔谈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154册第40—41页。
- ⑥ [清] 黄正元编，《太上宝筏图说》，光绪十八年竹筒斋书局石印本，第3页。
- ⑦ [元] 脱脱等撰：《宋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28册第9652页。
- ⑧ [元] 脱脱等撰：《宋史》，第15册第5197页。
- ⑨ 吴枫主编：《简明中国古籍辞典》，长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07页。
- ⑩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(eds.), *The Taoist Canon: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* (《道藏通考》), Vol. 2, 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4, p. 740.
- ⑪ 参看王利器：《〈太上感应篇〉解题》，《中国道教》1989年第4期；朱越利：《〈太上感应篇〉

- 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》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1983年第4期；拙作《〈太上感应篇〉文本来源及其成书时间考析》，《宗教学研究》2017年第1期。
- ⑫ 王利器：《〈太上感应篇〉解题》，《中国道教》1989年第4期，第11页。
- ⑬⑭⑮ 李剑国撰：《宋代志怪传奇叙录》，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300、302、218页。
- ⑭ [宋] 李昌龄辑：《乐善录·序》，民国二十四年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刻本，第1页。
- ⑮⑯ [宋] 晁公武撰，赵希弁重编并撰：《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》附志卷第5上，淳祐中袁州刊本，第53、53页。
- ⑰ 萧登福：《〈抱朴子内·微旨〉所见道教修炼法门探论》，李满林主编：《葛洪生态健康文化研究》，武汉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79页。
-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同注④，第7、1、8、57、20、13、111、129、4页。
- ⑲ 李之亮编：《宋代路分长官通考（下册）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03年，第1838页。
- ⑳ 具体考证请参看拙文：《宋理宗刊印〈太上感应篇〉的缘由及其影响》，《中州学刊》2018年第1期，第108—113页。
- ㉑ 淳祐九年（1249），赵希弁依黎安朝嘱托，依家中所藏古籍校勘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，将晁氏未载者，编《附志》加以补充。
- ㉒④ [清] 沈叔埏撰：《颐彩堂文集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8册第410、410页。
- ㉓ 曾枣庄、刘琳主编：《全宋文》，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、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308册第247页。
- ㉔ 龙显昭、黄海德主编：《巴蜀道教碑文集成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88—89页。
- ㉕ 鲁迅著：《中国小说史略：汉文学史纲要》，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4年，第297页。
- ㉖ 丁岚著：《李昌龄〈乐善录〉研究》，成都：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，2012年，第21页。
- ㉗ [清] 钱大昕撰：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又续卷6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891册第555页。
- ㉘ [清] 汤来贺撰：《内省斋文集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97年，第199册第399—400页。
- ㉙ [清] 余集撰：《秋室学古录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60册第285—286页。
- ㉚ [清] 刘沅撰：《太上感应篇注释》，嘉庆九年扶经堂藏板，第9页。
- ㉛ [清] 俞樾撰：《太上感应篇缙义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8页。
- ㉜ 王卡、汪桂平主编：《三洞拾遗》，合肥：黄山书社，2005年，第5册第313—320页。